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五十六期 (2026 年 7 月) 頁 81-127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 從異化到重構：零工勞動中的勞動價值與主體性再思

楊士奇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創新研究所

地址：8042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E-mail: simbaya@mail.nsysu.edu.tw

## 摘要

本文旨在探究當代零工勞動條件下，勞動者如何在結構性異化中重構勞動價值與主體性。數位平台與演算法治理的興起，以任務片段化、評價機制與不穩定的時間結構，系統性地侵蝕勞動作為自我理解與生命敘事基礎的可能，使得勞動者陷入時間不可積累、關係難以穩定、意義無從統整的三重敘事斷裂。本文試圖由此出發，探問在這樣的斷裂條件下，勞動者是否仍有可能重建一種可被承擔與延續的生命敘事。

---

投稿日期：2025.12.17；接受刊登日期：2026.03.20

責任校對：王尚、周孟平

DOI: 10.30393/TNCUP.202607\_(56).0003

本文的核心論點在於：敘事的連續性是勞動價值與主體性得以重構的關鍵條件，而此連續性正是勞動者在時間、關係與意義三個維度上的承擔判斷中逐步建立的。所謂「承擔判斷」，是指勞動者在具體勞動中，對時間的使用方式、關係的維繫品質與意義的判斷標準，承擔起不可讓渡的責任；在此承擔中，價值既非由市場或演算法單方面決定，也非任意的內在投射，而是從實踐的過程中湧現。勞動價值的重構與主體性的重構，因此並非兩個分離的課題，而是在勞動者承擔判斷的實踐中同時生成。透過匠心與編輯思維這兩條互補路徑，勞動者得以實現此一承擔：前者以深耕與長期技藝承諾為核心，後者以碎裂經驗的再組織與意義編織為核心，從而回應零工勞動所帶來的三重敘事斷裂。

本文進一步指出，承擔判斷的展開預設了特定的社會條件，零工勞動者的類型光譜決定了這些條件的可得程度，微觀的主體實踐並無法取代宏觀的制度改革；然而即便在條件最為惡劣之處，承擔判斷作為維持主體性的最低限度實踐，仍具有不可被取消的哲學意義。

**關鍵詞：**零工勞動、敘事、匠心、編輯思維、承擔判斷、主體性、價值

# 從異化到重構：零工勞動中的勞動價值與主體性再思\*

## 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結構的重組與數位網路科技所引發的社會運作模式轉變，「零工勞動」(gig work) 已成為當代勞動市場最具變革性的現象之一。當代所謂的零工勞動，泛指透過線上的數位平台或線下非平台之工作／任務媒合，以短期、非固定契約與按件、按時或按項目計酬為主要特徵的就業形式。勞動者可在線上平台或線下取得勞務與提供、交付從微型任務到大型專案的服務，其勞務取得方式包括演算法派單、評價體系、競標機制，或與雇主之不定期契約與兼職等安排 (De Stefano 2016; Eurofound 2018; ILO 2021; World Bank 2023)。<sup>1</sup> 這種以任務導向與非長期契約為特徵的勞動形態，逐步呈現為具有一

---

\* 本文初稿曾於「第五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2025 年 5 月 21-23 日)宣讀，感謝彭昉、潘美玲、謝斐宇等諸位教授的提問與評論，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審查意見，使我得以進一步思考並補正本文理解不足與疏漏之處。

<sup>1</sup> 根據世界銀行於 2023 年發布的報告，全球僅線上平台的零工勞動者人數即估計介於 1.54 億至 4.35 億之間，約佔全球勞動力的 4.4% 至 12.5%；在多數 OECD 國家，相關非傳統就業如部分時間、臨時、派遣、自僱等勞動人口已佔總就業的三分之一以上 (OECD 2019)。在台灣，雖然尚無針對零工勞動的專門官方統計，但亦可由相關非典型就業數據推估其規模：2022 年非典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約 79.8 萬、占 7.02%；2023 年 80.6 萬、占 7.01%；2024 年約 80.4 萬、占 6.95%（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2、2023、2024）。另就平台外送而言，政府研究彙整指出外送員由 2019 年約 4.5 萬增至 2022 年約 14.5 萬，呈現明顯上升趨勢（沈志勳、邱雅芳、蔡宜縉 2023）。這裡須強調的是，非典型就業與平台外送之間在統計口徑上不可直接加總，僅能作為不同面向的規模指標與趨勢觀察。

定規模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並反過來規制了零工勞動的條件與樣態，顛覆了工業時代以穩定雇傭關係為主的勞動模式。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框架與全球化的結構性運作下，愈來愈多的勞動者被納入這種看似自由靈活、實則高度不穩定的勞動體系中 (Kalleberg 2011; Schor 2020)。

零工經濟的崛起，使得勞動的存在論意義發生質變。傳統上，工作被視為實現自我與參與社會的基本途徑，亦是人格塑造與生命敘事的核心構成 (Arendt 1958/1998; Sennett 1998)。然而，零工勞動的結構性條件正逐步鬆動這樣的價值連結：一方面，這種新型態的勞動去制度化、去時間化，瓦解了穩定性與長期規劃的可能，導致勞動者的生活充斥著高度不確定性與存在焦慮；另一方面，在市場與科學技術交織的治理環境下，勞動者雖擁有表面的自主與彈性，實際上卻受到演算法、需求波動與價格競爭等多重機制的結構性宰制 (Kalleberg 2011; van Doorn 2017)。

世人對零工勞動的觀感與分析，呈現為辯證性的對立。一種是批判的立場，認為零工勞動是新自由主義勞動彈性化的極致表現，其本質是一種深度異化的勞動形式。馬克思所提出的「異化勞動」(alienated labor) 理論在此有新時代的進展：在數位資本主義體系下，勞動者被迫將自身勞動力碎片化、商品化，且無法掌控其勞動成果、過程與數據，進而失去與自我、本質、他人及社會的有機連結。韓炳哲 (Byung-Chul Han) 便曾指出，當代勞動不再單純以外在壓迫形式存在，而是轉化為一種自我剝削的結構，即，勞動者自願接受高度競爭、耗竭自身。在此理論框架中，零工勞動被理解為資本對人類主體的深層侵入，構成生命政治 (biopolitics) 與主體形構的根本危機 (Marx 1844/2007; Han 2015; Foucault 2008)。

另一種類型的觀點則是以自主與賦權的機會導向與轉型思維為主，認為零工勞動是專業人士創造多元職涯的自主機會與嶄新領域。

McGovern 認為，零工經濟中的平台勞動創造了「專業獨立工作者」的新範疇，讓具（多元）專長的人才能在不同專案間流動，同時保持工作控制權與專業成長；Mulcahy 則指出，零工勞動打破了傳統「一份工作、一個雇主」的雇傭體制，令個人能建立多元收入來源，並發展「（多元）職業投資組合」。在這種框架下，勞動者不僅能依據個人時間管理和生活優先順序安排工作，更能透過多重專業身份的建立，分散職業風險，增強經濟安全感。此類觀點認為，零工勞動並非僅是臨時性或過渡性安排，而是現代工作者積極建構兼顧（多元）專業發展與生活平衡的策略性選擇 (McGovern 2017; Mulcahy 2016)。

要之，上述兩種立場皆有其洞見，卻也各有侷限。批判的路徑雖然揭示了資本主義架構下的結構性宰制與主體碎裂，但往往過於強調結構決定性，忽視了個體在日常勞動實踐中的能動性與抵抗策略；而機會導向的路徑雖強調個人自主性與生活多元性，卻系統性地輕忽彈性資本主義、平台資本主義等所建構的剝削機制與風險轉嫁結構。更重要的是，表面上看，兩者分別從結構批判與個人策略出發，立場迥異；然而，它們實際上有著一個共同的關鍵困境：無論是將主體理解為被結構全面收編宰制的存在，抑或將其想像為可自由調度自身資源的行動者，兩者都未能充分說明，在高度碎片化與不穩定的勞動條件下，勞動者是否、以及如何仍可能形成可被承擔與延續的自我理解。有鑑於此，本文的核心問題便在於探究：在結構性異化與高度不穩定的零工勞動條件下，當代勞動者是否仍有可能維持並重建一種可被承擔與延續的生命敘事，從而使勞動不僅止於作為謀生手段，而仍得以支撐主體的自我理解與價值定位？換言之，當既有職業路徑與長期制度保障不再穩定時，勞動者是否仍可能將自身的行動理解為一段可回顧、可敘說、可負責的生命歷程？

這個問題的關鍵，正如 Richard Sennett 於《品格的腐蝕》(*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中所揭示的：新資本主義的彈性勞動模式徹底

破壞了傳統職業生涯所提供的敘事連續性 (narrative continuity)，即，那種使人能夠講述「我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的時間框架被破壞了：當工作變成一連串短期且彼此缺乏連結的任務、當職涯軌跡變得難以預期，勞動者便逐漸失去將自身勞動經驗整合為有意義故事的條件 (Sennett 1998: 26-30)。正如 Paul Ricoeur 所指出的，敘事認同 (narrative identity) 乃是自我認同得以成立的重要形式之一，我們往往通過講述自身的生命故事來理解「我是誰」(Ricoeur 1992: 114)；然而，當作為人生主要活動之一的勞動經歷無法被整合為連貫的敘事時，主體便難以維持一種可被承擔與延續的自我理解。

本文的核心論點在於：勞動者欲重構勞動主體性與勞動價值的關鍵條件，在於維持敘事的連續性，而此連續性可透過三個彼此交織的維度展開，並承擔相應的實踐責任，即，在時間的串接上、在關係的編織上，以及在意義的判斷上。本文認為，在當代零工勞動的情境中，這種重建的可能性蘊藏於兩種互補的實踐姿態之中：Sennett 所主張的「匠心」(craftsmanship)，以及本文借鑒松岡正剛與安藤昭子關於編輯工學之觀點所提煉發展的「編輯思維」(editorial thinking)。匠心指涉一種透過持久實踐與技藝鍛煉承擔時間的實踐取向，要求勞動者在與材料、工具和過程的長期互動中逐步累積經驗與判斷，並在此過程中形成一條可被敘述的生命脈絡；編輯思維則是一種在面對異質材料與零散經驗時，仍願意承擔關聯判斷與意義組織責任的實踐姿態，使碎片化的工作經驗得以被重新組織為一條可被理解的實踐軌跡。兩者分別回應了勞動經驗中不同層面的斷裂：前者著眼於反覆實作與長期承諾，後者處理高度碎片化的處境，思考如何重新組織經驗之間的關聯。本文將由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出發，分析零工勞動所帶來的虛假自由如何導致勞動者喪失以職涯為核心的生命敘事能力，並嘗試開展一條由實踐倫理與敘事哲學交織的思考路徑，最終指出當代零工勞動的核心問題在於：主體如何於不確定與不穩定之中，透過對時間、關係與意義的承擔判斷，重新生成自身的勞動價值與存在意義。

## 貳、異化勞動與新自由主義下的虛假自由

雖然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起自十九世紀的工業資本主義，然而其關於勞動者與自身勞動、勞動成果、社會與人的類本質之間斷裂的種種洞察，在平台資本主義的技術條件下，非但未被克服，反而以更為精緻與內化的形式持續運作 (Marx 1844/2007; Fuchs 2014)。根據馬克思的分析，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勞動異化可分為四個面向：(1) 勞動成果的異化；(2) 勞動過程的異化；(3) 類本質的異化；(4) 社會關係的異化 (Marx 1844/2007)。在零工經濟的體系下，這四個面向有新的進展面貌。

首先是勞動成果的異化。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勞動者所創造的產品不再屬於自己，而是成為一種與勞動者相對立的「異己力量」(alien power)，並脫離其意志的支配。產品愈豐富、勞動力愈強大，勞動者在經濟上愈陷於貧困；他所創造的價值愈多，自己作為人的社會與人性價值反而愈被貶抑 (Marx 1844/2007)。在零工經濟中，此一異化形式呈現出雙重剝奪的特徵：一是傳統的勞動成果剝奪，諸如外送員的配送服務、線上叫車的載客服務、線上創意工作者的數位產出等，其使用價值在勞動完成的瞬間即被平台佔有並轉化為交換價值，勞動者僅能獲得以件計酬的微薄報酬，無法分享其勞動所創造的完整社會價值；二是新興的數據剩餘價值榨取，勞動者在提供服務過程中所產生的行為軌跡、消費偏好、社會連結等數據，都被平台系統性地蒐集、處理並商品化，進一步轉化為演算法優化、精準行銷與市場預測的核心資產 (Smicek 2017)。這些「數據勞動」不僅未被承認為勞動，反而成為平台資本累積的重要來源。零工勞動者在此面對雙重的異己力量：既有的商品形式，以及新興的數據商品形式。

其次，勞動過程的異化在零工勞動中展現為勞動活動本身的陌生化與外在強制。對馬克思而言，勞動過程的異化不僅意味著勞動者失

去對勞動過程的掌控，更重要的是勞動活動本身變得痛苦、機械性且缺乏意義，使得勞動不再是人的本質力量的自由發揮，而成為純粹的生存手段 (Marx 1844/2007)。在零工勞動中，這種異化透過演算法治理達到新的精緻化程度。表面上，零工勞動者享有選擇工作時間與任務的「自主性」，但實際的勞動過程卻被更為隱蔽的技術手段所支配：(1) 計量化規訓：複雜的服務勞動被簡化為可計算的評分指標，勞動者必須持續監控並調整自身行為以維持系統要求的績效標準，勞動過程變成對績效數量的追逐，而非對服務品質的關注 (Rosenblat & Stark 2016)；(2) 演算法黑箱的專制：派單邏輯、價格設定、懲罰機制等核心決策完全不透明，勞動者只能被動適應系統規則，無法理解或影響自身的勞動條件 (Pasquale 2015)；(3) 偽市場的操控：透過「供需平衡」的市場語法，平台實際上操縱勞動者的時空選擇與勞動強度，將市場風險完全轉嫁給個體承擔 (Wood et al. 2019)。這種演算法治理術使得勞動過程不僅外在於勞動者，更以一種技術理性的面貌掩蓋其強制本質，在形式自由的表象下，勞動者實質上是不自由的。

第三，類本質 (Gattungswesen; species-being) 的異化在零工勞動中表現為創造性實踐能力的系統性消解。馬克思的類本質概念指向人類獨有的自覺生產活動能力：人不僅能夠有意識地改造外在世界，更能夠在此過程中實現自我對象化，亦即透過勞動認識並發展自身的本質力量 (Marx 1844/2007)。在零工勞動中，每項勞動任務都被分解為可重複的標準化操作，勞動者的個人經驗、創意判斷和問題解決能力被演算法的預設程序接管；勞動活動失去整體性與連續性，勞動者難以形成完整的技能體系與職業認同。大量看似自動化的服務，實際上仰賴被隱形的人類判斷，勞動者被嵌入為預設程序的一環，成為自動化鏈條中不可見但必須服從的節點 (Gray & Suri 2019)。這種去人格化的勞動形態不僅剝奪了勞動者的創造性，也阻礙了勞動者對生產過程整體的理解與掌控，使人類勞動退化為機械性的功能執行，並使勞動者逐步失去以勞動為基礎建構自我敘事與存在意義的可能。

第四，社會關係的異化在零工勞動中呈現為人際關係的物化與虛假共同體的建構。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產的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表現為物與物之間的關係，人的社會性被抽象化為交換關係 (Marx 1844/2007; 1867/1976)，而在零工經濟中，這種物化達到新的高度。以平台型的零工勞動為例：(1) 勞動者關係的競爭化：平台透過排行榜、差別獎勵與接单限制，將具有共同利益的勞動者塑造成相互競爭的原子化個體，使勞動者將結構性剝削內化為個人能力與努力的差異 (Gandini 2019)；(2) 社會關係的數據化：勞動者與消費者、勞動者與平台、勞動者彼此之間的真實人際交往，都被抽象化為可被演算法處理的資訊數據，社會關係的豐富性與複雜性被技術邏輯所消解；(3) 虛假共同體的意識形態功能：平台一方面加劇勞動者之間的競爭與隔離，另一方面又營造虛假的歸屬感，將勞動者納入企業文化的框架中，掩蓋勞動關係的根本對立 (Huws 2014)。

在零工勞動的結構條件下，這四種異化形式不僅存續，更呈現質變與深化。平台型工作者如 Uber 司機、外送員、自由接案者等，面臨的是演算法透過限定、評等、替換與獎懲等機制所形成的多層次控制 (Kellogg et al. 2020)，其特徵包括：(1) 高度的資訊不對稱，平台掌握全局數據而勞動者僅能被動接受資訊；(2) 隱性的行為控制，通過評分制度與獎懲機制形塑勞動者行為；(3) 風險的單向轉嫁，勞動者承擔經濟波動與工作不穩定性的全部後果 (van Doorn & Badger 2020)。

我們還可將零工勞動的異化結構，置於更廣泛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框架中來理解。在 Foucault 的分析中，「治理術」並不僅限於國家對人口的管理，而是一種滲透於制度、規則與日常實踐中的「治理理性」，其特徵在於以自由為治理的手段，促使個體將市場邏輯內化為自我行動的規範 (Foucault 2008)。沿此脈絡，Dardot 與 Laval 進一步指出，新自由主義首先且根本上是一種治理理性，它不僅組織統

治者的行動，更透過話語、實踐與各種裝置，將競爭普遍化為行為規範，將企業形式普遍化為主體化的模型，從而積極地生產出特定類型的社會關係、生活方式與主體性 (Dardot & Laval 2014: 3-4)；Brown 則補充了這一進程的政治哲學含義：新自由主義的治理理性不僅重塑了個體的理解，更系統性地將政治主體 (homo politicus) 改造為以市場邏輯全面運作的經濟主體 (homo oeconomicus)，從而侵蝕了公民在公共生活中進行價值判斷的能力本身 (Brown 2015)。

在新自由主義治理術的操作中，主體的建構包含三個核心環節。首先，個體被重新定義為「自身的企業家」(entrepreneur of himself)，被要求將自身視為可投資、可增值的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以企業經營的邏輯管理自身 (Foucault 2008: 225-226)。其次，市場競爭邏輯被內化為個人倫理，個體透過自我優化、績效量化與風險自擔等行為，使自身行為符應這套治理理性所建構的倫理框架，個人責任取代了社會結構的可問責性，將生存表現轉化為道德優越的象徵 (Read 2009; Rose 1999)。第三，原本屬於集體性的社會問題被個人化處理，結構性不平等被包裝為個人選擇與失敗的結果，進一步鞏固了新自由主義的責任轉嫁機制 (Rose 1999)。

在此治理邏輯下，「自由」被重新定義。它不再是公共參與或集體自決的實踐能力，而是被壓縮為市場中的選擇權。然而，零工勞動者所擁有的，僅僅是免於直接命令與雇主控制的表面自由，真正能實現自我目的、實質參與社會生活的自由，則在平台演算當中被系統性地剝奪 (Vallas & Schor 2020)。由 Foucault 論治理術的視角來看，零工勞動中的「彈性」與「自主」等話語，正是新自由主義權力運作的精緻展現：權力不再經由命令、禁令等顯性手段發揮作用，而是透過構築「可能行動的場域」與塑造個體的欲望結構，引導行動者主動內化並配合體制邏輯 (Foucault 1982; Dean 2010; Dardot & Laval 2014)。具體而言，零工勞動者的「選擇自由」呈現出三重虛假性：第一，選

選擇的前提受限，在缺乏普遍基本收入或充分社會保障的情況下，「選擇工作」往往不是真正的選擇，而是生存壓力下的被迫接受；第二，選擇的範圍受控，平台通過演算法分配與激勵機制，精確控制勞動者可選擇的工作類型、時間與報酬範圍；第三，選擇的後果個人化，勞動者必須獨自承擔所有「選擇」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從醫療保險到職業傷害，從收入波動到技能過時，最終構成高度個人化的結構性風險 (Ravenelle 2019)。

綜合馬克思的異化理論與 Foucault 的治理術視角，零工勞動者所處的位置可被概念化為一種表面自主而實質他決、形式多元卻實質單一的矛盾狀態。在生存壓力與自我實現期待的雙重夾擊中，這些勞動者難以形成穩固的職業身份與價值連續性，進而面臨主體碎片化、社會關係疏離與生命敘事斷裂等存在困境 (Marx 1844/2007; Foucault 2008)。由敘事連續性的角度重新審視上述四種異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零工勞動對勞動者主體性的破壞，本質上是對其敘事能力的系統性剝奪。這種剝奪同時在時間、關係與意義三個維度上展開：在時間維度上，勞動成果的異化與勞動過程的異化，共同造成了經驗的不可積累性；外送員送了一萬單與送了十單，在敘事層面並無本質差異，兩者都只是「完成任務」，而非「我正在成為某種人」的可述說軌跡，勞動者因此被困在永恆的當下，時間在重複中消耗，而非在積累中沉澱。在關係維度上，社會關係的異化使每一次與餐廳老闆、顧客的接觸都是匿名的、一次性的，無法沉澱為「某人見證了我的成長」這樣的關係敘事，零工勞動者淪為孤立的「任務執行者」，失去了在社會網絡中定位自己的基礎。在意義維度上，類本質的異化造成了勞動的不可理解性，當勞動被去技能化、模組化，當創造性被演算法接管，勞動者便無法回答「我為什麼做這個」、「這對我的人生有何意義」這樣的根本問題，勞動淪為純粹的功能執行，無法成為「我是誰」的自我理解依據。當敘事連續性在這三個維度上同時斷裂，零工勞動的危機便不只是經濟或制度層面的，更是存在論層次的敘事危機。

正如前述，敘事不只是被動的描述，更是主動的重構；即使在結構性的敘事斷裂中，主體仍保有透過敘事實踐來重建自身的可能性。有鑑於此，本文主張可由個別勞動主體的實踐層次出發，回應時間、關係與意義三個維度的斷裂困境，進而探討在結構性異化中仍可能萌發的能動性空間與主體重構策略。這種潛在的實踐，不必然要求革命性地改變整個體系制度，而是可在個別勞動者對時間的承擔、關係的編織與意義的判斷等微觀實踐中逐步展開。正是在這樣的理解下，下一節將展開：匠心與編輯思維如何作為兩種互補的敘事實踐，以及如何在時間、關係、意義三個維度上，使敘事連續性的重建成為可能。

### 參、由勞動主體出發的反向實踐可能：匠心與編輯思維

一如前述，當代零工勞動者大多處於新自由主義治理邏輯與平台資本主義的結構性調度中，面對著時空碎片化的工作條件與逐漸消失的職涯連續性。然而，正如 Foucault 所指出，權力運作從不是單向的宰制，它同時蘊含了反思與抵抗的辯證可能性；即使在深度異化與系統性規訓的場域之中，主體並非全然失能，而仍可能在結構裂縫中開展一種反向實踐的倫理空間 (Foucault 1982; 2007)。據此，本文主張，在零工勞動中導入「匠心」與「編輯思維」的思考，恰可作為零工經濟條件下的兩種互補性反向實踐策略：前者以深耕與時間承諾對抗勞動加速邏輯，後者以連結與重組維繫意義與敘事的連續性。

#### 一、匠心：勞動作為自我修鍊與倫理實踐

Sennett 在其著作《匠人》(*The Craftsman*) 中，重新思考並建構「匠人精神」的當代意涵 (Sennett 2008)。他指出，匠人並非單純執

行技術的勞動者，而是透過長期的專注與實作，建立起對材料、工具與過程的細緻理解，並由此獲得一種內在滿足與倫理責任感。此間，匠心 (craftsmanship) 指的是一種「持久且基本的人類衝動，即，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態度 (Sennett 2008: 9)，它可超越特定職業類別，成為一種對勞動本身的倫理態度：對過程細節的堅持、對卓越的持續追求、對作品完整性的責任承擔，這些元素共同構成了匠人的實踐倫理。

Sennett 的匠心理論建立在對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關於技藝 (technē) 與實踐智 (phronēsis) 的當代詮釋上，並吸取了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對工具與存在關係的洞見。他指出，匠人透過對技藝的長期投入與反覆鍛鍊，實際上是在實踐「製作即思考」(making is thinking) 的命題。此處的「製作」，正是勞動在目的性與技藝維度上的具體展現；這裡的「思考」，也不同于純粹抽象的理論推演，而是一種深深植根於實作的「物質性意識」(material consciousness)：透過手與材料的直接互動，在嘗試與錯誤、調整與修正的循環中，培養出對細節的持續敏感。這種敏感並不是外加的技巧，而是一種「體現的知識」(embodied knowledge)，如海德格所言，工具並非孤立的物件，而是在使用中成為人類活動的延伸與世界關係的一部分；對 Sennett 而言，勞動的價值不僅在於製作物件，更在於這個過程同時形塑了勞動者的判斷力、耐心與專注，使思考與創作融為一體，成為持續自我生成與精進的生命實踐 (Heidegger 1927/1962; Sennett 2008)。

匠心的實踐對於當代的零工勞動發展具有多重意涵。首先，它重新引入「時間性」(temporality) 作為勞動價值的核心維度。相對於平台治理強調的即時反應與短期效益，匠心要求對技藝的長期投入與漸進式演化，這構成了對資本主義加速邏輯 (logic of acceleration) 的隱性抵抗 (Rosa 2013)。其次，匠心重新連結了「勞動」與「自我」，使二者不再是異化的對立面。透過在勞動中注入個人風格、倫理判斷

與美學標準，勞動者拒絕成為可替換的執行者，而成為有獨特風格的創造者。正如 Sennett 所言：「每一位優秀的匠人都會在具體的實踐和思考之間進行對話；這種對話發展成持續性的習慣，習慣進而形成『解題與尋題』的節奏。」(Sennett 2008: 9) 這暗示著一種勞動與生命的有機整合，這種整合並非單純的自我滿足，而是一種持續在實踐中生成意義的過程，即，勞動者在與作品的往返對話中，不僅塑造了工作的成果，也在反覆調整與修正中塑造了自身的價值觀、倫理立場與生活節奏。

第三，匠心實踐挑戰了市場作為唯一評價標準的霸權。在匠心展開的勞動實踐中，工作的價值不僅來自外在的市場定價或客戶評價，更來自勞動者對卓越標準的內在追求與同行社群的專業認可。這建立了一種相對自主的價值評價體系，部分地脫離了資本主義的純粹交換邏輯。連帶的，匠心也包含一種「對物的倫理」，即對勞動對象的尊重與責任。無論是程式碼、食物、文字或服務等，匠心實踐者都試圖理解它們的內在特性與可能性，這構成了一種非工具性的世界關係：這不僅是一種專業態度，更是對抗資本主義將一切物化為交易對象的抵抗姿態。

在零工勞動的結構性限制中，勞動者要落實匠心確實面臨諸多挑戰，包括高度碎片化的工時安排、即時性的市場調度需求，以及平台所施加的標準化評價機制等。然而，正因為這些壓力的存在，匠心的堅持不僅是一種專業倫理，更是對結構條件的積極回應：透過在勞動中持續注入個人風格、倫理判斷與美學標準，勞動者得以在平台的治理邏輯之外，保留對工作節奏與品質的自主掌控。這樣的勞動實踐，不僅是維持技藝深度與專業尊嚴，也是在同儕、顧客與社群之間累積一套不同於市場評分的评价機制，使勞動回歸其內在價值。於是，匠心不再只是個人的職業態度，而是面對加速化、標準化與去技能化趨勢時，一種重申「何謂值得的工作」的方式與起點。

## 二、編輯思維：資源整合與創造性再組織的能力

若說「匠心」所關注的，是透過深耕與專注的技藝實踐，回應勞動異化所帶來的倫理困境，那麼「編輯思維」所標示的，則是另一個同樣關鍵卻常被忽略的能力維度：在高度資訊化與任務碎片化的勞動條件下，如何透過連結與重組，令零散的素材得以轉化為可承載意義的材料結構。本文所稱「編輯思維」，便是源自日本思想家松岡正剛與安藤昭子將編輯視為知識實踐的理論洞見，並在此基礎上加以轉化，使之成為一種可用以理解與回應當代零工勞動處境的存在策略與認知取向。

要之，松岡正剛認為，編輯並非只是資料的再排列技術，而是一種從異質素材中發掘關係、構築秩序的知識生成方式。他提出「編輯工學」作為理解世界的操作方法，強調資訊之間並不必然存在先驗的結構，而可以透過編輯行動以產生意義與系統。編輯行動的關鍵，在於捕捉關聯性並組織其連續，從而形構一種能動的知識網絡。他拒絕線性與分類主義，主張以開放、轉換與嵌合的方式進行認識的構成，將編輯視為在多樣性中實現通透連接的實踐智慧（松岡正剛 2023）。

延續此一觀點，安藤昭子進一步將編輯工學定位為「生命活動的操作系統」，主張編輯不僅是理解世界的方法，更是回應世界複雜性和多變性的實踐架構。她提出十種編輯思考術，涵蓋從資訊的感知與篩選、跨情境的類比與聯想，到以故事原型驅動意義生成等操作模式，目的在於幫助主體於碎片化與資訊過剩中重構可感的秩序，「讓世界與自己重新連結」。她特別強調，編輯是一種價值生產行為，涉及素材、語境與意義框架的選擇與安排，因此編輯工學不僅具有認識論含義，更蘊含倫理性與主體性。編輯者並非被動處理者，而是能動的意義生成者，在操作異質素材的同時，也重新界定了與世界的關係（安藤昭子 2022）。

綜合松岡與安藤的論述，可以看到他們皆將編輯理解為一種穿越複雜與碎裂、在異質之間建立關聯並生成秩序的實踐能力。這種能力所指向的，並不僅是處理資料或安排資訊的技巧，而是關乎人如何在片段化經驗已成常態的情境中，仍能為自身的經驗建構出某種連續性與可理解的意義結構。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由松岡與安藤關於編輯工學的討論，抽取其更為根本的思想含義，並將之轉化為一種可用以理解當代勞動處境的「編輯思維」。

不同於松岡與安藤所使用的「工學」，此處所指「思維」，並非指涉一套可被套用的操作程序，而是指一種面對碎裂經驗時的理解取向與實踐姿態：一種在異質要素之間尋找關聯、在不確定條件中反覆地組織意義，並嘗試為自身行動維持可理解結構的方式。編輯思維具有以下核心特徵。第一，非線性資料的識讀與編排能力：面對碎片化資訊，能夠識別潛在關聯、捕捉隱含模式，並重新組織為有意義的整體。這不僅是技術能力，更是一種認識論立場，拒絕簡單的線性因果關係，擁抱複雜性與關係性思維。第二，跨情境的轉譯與重構能力：能將一個領域的知識、經驗與技能，轉譯並應用於另一情境。在零工勞動中，這意味著勞動者能夠跨越不同任務、平台與角色，保持某種實踐的連續性與知識的可轉移性。第三，對脈絡與整體的敏感性：編輯並非機械性拼貼，而是對整體效果與內在邏輯的持續關注。這種思維模式使勞動者不僅關注單一任務的完成，更關注其在更大生命圖景與職涯脈絡中的位置與意義。

編輯思維據而與當代零工勞動者的處境緊密相關，因為他們面臨的核心挑戰是：如何在任務斷裂、角色轉換頻繁與時間經驗碎片化的條件中，仍能為自身的行動維持某種可理解的連續性。透過編輯思維，勞動者可以將零散經驗整合為一條可述說的實踐軌跡，並將跨領域的技能與經驗編織為獨特的實踐組合，逐步形構出具有辨識度的實踐輪廓，從而在結構性的不確定中，為自身的行動確立某種方向感與

可辨識性。正如 Sennett 所指出，技藝的養成從來不是線性累積的過程，而是在具體情境中的不斷調整與修正之中，使看似零散的經驗逐步凝聚為可辨識的專業模式 (Sennett 2008)。

### 三、匠心與編輯思維的合觀與辯證

在當代零工勞動的碎裂條件下，匠心與編輯思維分別代表了兩種看似迥異的主體實踐路徑：前者指向深入、專注與時間的倫理承諾，後者則開展於連結、翻譯與意義重組的能力維度。表面上看來，匠心較為內向、具體與深耕，而編輯思維則偏向外向、多元與跨域。然而，若由主體性的重構問題來看，二者實際上構成一種互補而張力辯證的倫理圖式，可共同回應零工勞動所帶來之勞動者的異化處境與主體斷裂。

由知識如何在實踐中生成的角度來看，匠心首先提供了勞動者對於工作內容與技藝細節的深層敏感性，使得勞動主體得以在實踐中培養出判斷力、責任感與價值承擔。這種體現於手與材料之間的知識，是一切有意義的重組行動的素材來源。而編輯思維則將這些素材轉化為可組織的語義結構，透過跨情境的轉譯與脈絡化的聯繫，使勞動主體能從碎裂的經驗中，構築連續性的職業敘事與生命秩序。兩者的結合，令「實踐中的倫理」與「重組中的創造」得以相互滋養，避免匠心淪為孤立的形式主義，也避免編輯思維墮入表層的拼貼邏輯。

若進一步由實際的勞動實踐來看，匠心與編輯思維之於勞動者的意義並非只是兩種技術選項，而是構成兩種不同方向的主體生成技術。匠心透過對技藝節奏的掌握與長期倫理的堅持，協助勞動者抵抗即時評價與市場加速邏輯的壓制；編輯思維則透過對多重角色與跨域知識的整合，使勞動主體能在勞動類型多變的條件下維持自我一致性與價值連續性。在高度靈活性與不確定性的勞動條件中，兩者的交錯

實踐為勞動主體提供了「自我鍛鍊」與「情境適應」的雙重操作場域。

這種實踐圖式得以成立，其效能與倫理潛能取決於兩個核心條件：一是實踐空間的可得性，即，勞動者是否擁有足夠的時間、資源與自主性來進行匠心培養與意義編輯；二是制度環境的非收編性，即平台與市場是否不將這些實踐再度整合為治理機制的一部分。例如，平台可能將「匠人精神」作為經營與行銷的工具，將「個人品牌建構」作為績效評比標準，反過來鞏固既有的壓迫結構。換言之，匠心與編輯思維雖具反向實踐潛能，但若無自覺性地對其歷史條件與被收編風險進行反思，便有可能淪為平台治理邏輯的延伸與合法化工具。

此處，必須進一步澄清的是，並非所有訴諸自我實踐與個人修養的實踐，都足以構成對新自由主義治理邏輯的反向實踐。新自由主義治理正是透過鼓勵個體進行自我管理、自我優化和自我投資，而將結構性風險與責任內化為主體的道德義務的；然而，若一項實踐的價值判準完全依賴於市場回饋、平台評價或可量化的績效指標，那麼即便其表面上訴諸自主、彈性或創造性，仍難以脫離治理理性的收編。換言之，自我實踐本身並不必然具有批判性，其是否具備反向實踐的潛能，關鍵在於主體是否仍保有對價值判斷之不可讓渡的責任。基於此，本文所主張的匠心與編輯思維，並非意在提供零工勞動者一套更有效率的自我經營策略，而是指向一種拒絕將價值判斷完全交付外在機制的倫理姿態。匠心之所以具有反向實踐的意義，在於勞動者即便在缺乏即時回饋與外在肯定的情況下，仍願意為工作的品質、細節與完成方式承擔判斷責任，並將此責任視為勞動不可讓渡的一部分。同樣地，編輯思維亦不僅是對碎片化資源的靈活整合，更是一種對生命敘事與實踐方向進行主動選擇、刪除與連結的主體倫理實踐；在此過程中，勞動主體不再只是回應平台或市場所設定的價值座標，而是自行承擔「何者值得被保存、何者必須被捨棄」的判斷重擔。

據此，匠心與編輯思維之所以能構成一種有別於新自由主義自我

治理的實踐路徑，正在於它們並未以「適應體制」作為最終目標，而是試圖在高度碎片化與不穩定的勞動條件中，維持價值判斷不完全讓渡的可能性。此種實踐並不能保證成功，也無法免於被再度吸收的風險，但它至少在倫理層次上保留了一個關鍵差異：勞動主體不再僅僅是被評價、被計量的對象，而是仍然承擔著對自身實踐之意義、方向與品質負有責任的存在者。正是在此不可讓渡的責任之中，匠心與編輯思維得以超越自我調適的層次，成為零工勞動情境下重構主體性與勞動價值的關鍵實踐條件。

若將視野再推向存在的層次，則我們可以看到匠心與編輯思維共同構成一種「進行中的倫理主體」。這種主體既非自由意志的擁有者，也非被結構全然規定的承受者，而是透過不斷的實踐、調整與意義編織，在裂縫中尋找可居之地、可語之序與可承擔之價值。匠心所承載的是「時間中的自我」，而編輯思維則承擔「關係中的自我」；兩者的辯證運作，使得勞動主體在資本主義碎片化機制中，有機會得以開展一種非整體性、非穩定性，卻具有倫理感與歷史性的存在方式。

據上所述，匠心與編輯思維並非僅是兩種倫理實踐姿態，更提供了重新思考勞動價值的哲學視野與實踐基礎。它們由不同維度介入當代勞動的碎片化、加速化與去倫理化處境，使勞動不再只是受評價與被計量的對象，而重新成為主體自我構築與世界關係生成的場域。下一節，本文將在此論點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勞動價值與主體性如何在這些實踐中被重構，並嘗試提出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交換邏輯的價值理解方式。

## 肆、勞動價值與主體性的重構：在承擔判斷中生成

前一節說明匠心與編輯思維作為兩種互補的反向實踐，如何在零

工勞動的結構裂縫中開展主體重構的可能空間。然而，此實踐姿態的描述層次，尚未觸及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即，在這些實踐中，勞動的「價值」究竟如何被重新確立？它與主體性的重構之間，又構成何種關係？在本節中，我們將進一步指出，勞動價值的重構與主體性的重構並非是兩個分離的課題；恰恰相反，二者乃是在「承擔判斷」<sup>2</sup> 的實踐中同時生成的：它們是同一個實踐的內外兩面，而非先後相繼的兩個階段。

在資本主義的主流勞動倫理中，「價值」往往被窄化為生產效率、經濟報酬與市場流通性的量化指標。這種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導向的價值觀，不僅主導著社會對「成功職業」的集體想像，也滲透至個體自我認同與生涯選擇的存在層面。從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對現代性理性化的分析，到法蘭克福學派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與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 對工具理性的反思都指出，當價值評估被侷限於可計算的指標時，人類的各種實踐都將失去更深層次的倫理與意義基礎 (Weber 1904/2001; Horkheimer & Adorno 1944/2002; Horkheimer 1947)。隨著零工經濟的全球擴張，這

---

<sup>2</sup> 本文所稱「承擔判斷」，與 Hannah Arendt 的判斷理論既存在內在關聯，亦有根本差異。在《責任與判斷》(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2003) 中，Arendt 追問的，是個別主體在道德規則崩解的極端情境下，如何仍能為自身的判斷承擔責任，拒絕以服從規則或奉命行事替代真正的思考；就此而言，本文的「承擔判斷」與鄂蘭共同強調判斷責任的不可讓渡性。然而，Arendt 判斷理論的核心概念架構，主要展開於《康德政治哲學講稿》(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1982)：她繼承並改造了康德的「反思判斷」(reflective judgment) 概念，主張個別主體憑藉「擴大的心靈」(enlarged mentality) 與「共通感」(sensus communis)，在公共空間中對公共事務作出評價；這種判斷本質上是政治的，且具有回溯性，是行動完成之後，自旁觀者 (spectator) 的位置對已發生之事進行反思評價 (Arendt 1982)。本文的「承擔判斷」則站在行動者 (actor) 一側：它不是在公共領域中對已完成事件的回溯評價，而是勞動主體在具體實踐當下所承擔的存在論責任。兩者的根本差異在於場域：Arendt 的判斷屬於政治行動 (action) 的公共性層次，本文的「承擔判斷」則屬於勞動 (labor) 的存在論層次。

種傳統勞動價值觀進一步面臨解體與重組：勞動已不再是穩定、線性且累積性的生命過程，而轉變為高度碎片化、即時性與流動性的存在形式。

自古典政治經濟學以降，現代勞動價值理論主要分為兩大傳統：一是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勞動交換價值論，認為勞動之價值源於其市場交換能力 (Smith 1776/1976)；二是馬克思所發展的勞動內在價值論，強調勞動不僅是謀生手段，更是人類本質之實現場域 (Marx 1844/2007)。在當代資本主義演化中，前者顯然占據主導地位，使得勞動價值愈發被窄化為「生產性」與「可計量性」的維度。Boltanski 與 Chiapello 在《資本主義的新精神》(*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中指出，晚期資本主義藉由擴張「計算理性」將各種價值形式納入量化框架，導致勞動價值單一化、扁平化 (Boltanski & Chiapello 1999/2005)。在平台資本主義邏輯下，零工勞動更徹底被「可計算化」：每個任務都被定價、評分與數據化，價值徹底外部化為即時市場反應，而非來自勞動過程或關係品質的內在意義。這種價值機制導致了韓炳哲所描述之「成就社會」(achievement society) 的兩個核心困境：一方面，勞動者被迫進入無盡的「自我優化」(self-optimization) 循環，將自身轉化為不斷更新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另一方面，勞動不再具備超越功能性的意義維度，使個體處在高效能生產的同時，卻陷入意義匱乏的存在焦慮 (Han 2015)。

在零工勞動的脈絡下，這種價值異化呈現為三種極端形式。第一，極端即時性：價值被壓縮為勞動當下的交易與評分，使勞動失去時間厚度與沉澱可能；這種「時間壓縮」不僅改變勞動者的工作節奏，更透過加速機制剝奪勞動者對時間的自主權 (Rosa 2013)。第二，演算法決定論：在平台治理邏輯中，價值判斷被轉移至不透明的演算法機制，使勞動者面對一種「黑箱式」的價值系統；這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知識權力的重新分配，使勞動價值的界定權越發遠離勞動主體。

第三，假個人化的困境：平台表面上鼓勵「個人化」與「選擇自由」，但實際運作卻是高度標準化與功能導向，形成 Sennett 所批判的彈性專制，看似提供選擇，實則強化控制（參見 Sennett 1998）。這種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內在矛盾，使得當代零工勞動者陷入一種弔詭的處境：市場不斷要求他們投入更多認知與情感，但這些質性投入卻無法在現有價值系統中獲得相應的承認與報酬；勞動者被期待擁有企業家精神與創新能力，卻同時被剝奪了真正自主發展與專業累積的條件。

若僅由價值異化的角度來理解上述困境，則我們仍未觸及問題的全貌。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勞動價值之界定權的系統性轉移，同時也是一場主體性的危機。當勞動的價值完全由外在機制所界定，勞動者所失去的不僅是對價值的發言位置，更是在具體實踐中為自身勞動作出判斷的存在性基礎，即，那種使人得以回答「這份勞動對我而言意味著什麼」的自我理解能力；反過來說，當主體被還原為演算法的執行終端，勞動也就失去了承載內在價值的可能。價值的空洞化與主體的碎裂化，恰是同一個危機的兩面。

就此而言，本文的核心主張在於：勞動價值與主體性的重構，乃是勞動者在承擔判斷的實踐中同時生成的。此處所謂「承擔判斷」，是指個別勞動者在具體的勞動實踐中，主動為「何謂值得」、「何種品質可以接受」、「哪些經驗應被保存與延續」等問題，承擔起不可讓渡的判斷責任。正是在這個承擔的過程中，勞動的價值被重新確立，即，不再由市場、演算法或績效指標單方面決定，而是由勞動者在實踐中親自賦予、親自負責；與此同時，主體性也在這個承擔中獲得確立：勞動者不再僅是被評價的對象，而成為做出判斷並為之負責的存在者。此論不同於傳統價值理論的主客二分法：客觀價值論認為價值客觀存在，等待被發現；主觀價值論則認為價值來自主體的任意賦予。本文主張的第三條路徑是：價值在「承擔」中湧現；它既非客觀存在的外在事實，也非主觀任意的內心投射，而是在勞動者承擔判

斷責任的實踐過程中，逐步被確立、被彰顯。

### 一、時間維度：在承擔中積累

在時間方面，零工勞動的「即時性」與「彈性」常被誤認為是自由的象徵，但實際上是一種強化生產加速的治理技術，使個體陷入節奏失序與同步性危機之中，無法與自我、社會和技術的節奏保持共振 (Rosa 2013)。此間，問題不僅是工作節奏變快，更是勞動者逐漸喪失對時間如何被使用、如何被累積的判斷權：時間被還原為可被切割、計價與即時回收的資源，而不再是可被承擔與沉澱的實踐歷程。

Sennett 指出，技藝的養成是一種時間性的工作，且非線性直進，而是藉由反覆嘗試與細微差異的積累而漸次深化；重複之所以重要，正在於它能在看似相同的操作中帶出新的可能，使人逐步獲得專業的厚度與人格的塑型 (Sennett 2008)。若藉 Ricoeur 之眼，這種在時間中反覆實作的過程同時涉及「同一性」(idem) 與「自身性」(ipse) 的辯證：在變動中維持專業輪廓的同時，也透過承諾與修煉生成自我 (Ricoeur 1992)。當一個勞動者決定「即使沒有人看見、沒有額外報酬，這仍值得我投入時間」，那麼在這個決定中，時間便不再只是被平台切割的客觀資源，而是轉化為勞動者主動承擔、親自賦予意義的實踐場域。匠心所代表的因此並不只是技能的延續，更是一種對時間的倫理承擔，使勞動者即便在短期與不穩定的條件下，仍能透過技藝的深化，把零散片段串聯成持續性的生命敘事。

與此同時，編輯思維使勞動者得以將零散任務與短期工作片段，重新納入一個可被理解與回顧的時間框架之中。透過對經驗的選擇、排序與重組，編輯思維得以嘗試建立可累積的脈絡，使時間不再只是被平台即時計算所消耗的流量，而成為勞動主體能夠主動組織的實踐結構。當勞動者將看似毫無關聯的工作經驗重新編織為具有統一主題

的實踐軌跡時，他不僅是在「整理經驗」，更是在承擔對時間意義的判斷責任：這些時間片段值得被保存、被連結、被理解為某種軌跡。

## 二、關係維度：在編織中確立

新自由主義與平台治理邏輯傾向於將勞動者轉化為彼此競爭、彼此可替換的孤立個體，並透過評分機制、排序制度與接單規則，將原本具有倫理厚度的人際關係，壓縮為可被計算與比較的績效關係。然而，正如 Butler 所指出，人類主體本質上是關係性的存在，其自我理解與價值感，必然奠基於承認、依存與責任的網絡之中 (Butler 2015)。零工勞動者與客戶的互動高度匿名化、一次性，與同行被塑造為競爭者而無法形成社群，演算法黑箱更切斷了對過程的理解。這種關係的斷裂使得勞動經驗無法沉澱為關係敘事，主體因此失去了在社會網絡中定位自己的基礎。

匠心在此展現出一種不同於計量關係的「質量關係」取向。具有匠心的勞動者，並非僅以完成任務為目標，而是透過對品質、細節與責任的堅持，與作品、顧客或合作對象建立基於信任與承擔的連結，逐步在重複實踐中累積聲譽與專業認同，從而形成一種部分脫離平台即時評價體系的關係結構。就此而言，匠心實踐同時也是勞動者對自身關係模式所作出的判斷選擇：選擇將關係建立在品質與責任之上，而非僅僅服從於競爭與排序的邏輯。

編輯思維則進一步凸顯「關係再組織」的能動性。透過對不同專業場域、合作經驗與社會網絡的重新連結與配置，勞動者得以超越單一平台所設定的關係框架。這種再組織並非單純的機會累積，而是涉及對「哪些關係值得維繫」、「哪些連結具有長期意義」的持續判斷與取捨。這樣的主題式編輯，如 Ricoeur 所言，是一種「情節化」(emplotment) 的操作：將異質事件放入意義結構之中，使之產生關聯

與連續性 (Ricoeur 1984)。當勞動者能在此層次上重新承擔關係配置的判斷責任時，關係不再只是被平台分配的結果，而成為主體實踐中可被反思、選擇與重構的倫理場域。

### 三、意義維度：在定錨中彰顯

零工勞動者身處不穩定且高度競爭的環境，面對的不只是收入的不穩定，更是勞動本身價值感的流失。當市場評價與平台治理邏輯將勞動壓縮為單一的經濟報酬時，勞動便被降格為純粹的工具活動，無法支撐更廣泛的倫理期望與自我定位。換言之，勞動者往往落入了 Hannah Arendt 在思考人之為人的條件時所提出「活動生命」(vita activa) 三分論中的勞動層次：一種侷限於維繫生存循環的必要性活動 (Arendt 1958/1998)。在這個層次中，勞動既缺乏「工作」(work) 所帶來的持續性世界建構，也未能觸及「行動」(action) 所開啟的人際公共性與倫理關聯。零工勞動的意義困境，正是被困在這樣的層次而無法超越。

此間，匠心回應的是勞動的倫理承擔：在細節的專注、材料的回應以及反覆的技藝調整中，逐步生成一種源於「把事情做好本身就值得」的實踐信念，使勞動即便在無法被市場評分衡量之處，仍具有意義。更重要的是，當一個勞動者在缺乏外在肯定的情境下仍堅持某種品質標準，他實際上是在承擔對「何謂有意義的勞動」的判斷責任，而這個承擔本身，同時確立了他作為判斷者的主體位置。

編輯思維則進一步凸顯意義生成與價值整合的面向：透過批判性的篩選、組織與重組，為勞動建立一致且可持續的價值取向。如 Ricoeur 所區分，可測量的宇宙時間與帶有意義的生活時間之間，敘事正是將零散經驗轉化為整體的途徑。在這個基礎上，維持倫理立場是一種對敘事持續性的承擔：即使外在任務短暫、角色流動，勞動者

仍可透過堅守某些諸如對專業責任的忠誠、對品質的要求或對公正的認同等核心立場，使自身行動不致淪為雜亂片段，而能被整合進可理解的生命敘事。倫理立場所保障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穩定，而是一種「可持續的敘事性」：它使零工勞動者即便身處破碎的宇宙時間之中，仍能在生活時間裡維繫一條由價值導向的軸線，藉此保存生命故事的連續性與可理解性。

#### 四、承擔判斷的哲學定位

透過時間、關係與意義三個維度的分析，承擔判斷這個概念得以獲得更明確的哲學定位：承擔判斷既不是一種心理態度（如正向思考或心態調適），也不是一種道德勸說（如呼籲勞動者「應該」更認真工作），而是一種位於存在論與實踐論交會點上的主體化機制；它描述的是：在具體的勞動實踐中，主體如何透過對時間、關係與意義的判斷承擔，同時確立勞動的價值與自身的主體位置。

相對於亞當·斯密的交換價值論或馬克思的內在價值論等傳統勞動價值論點，承擔判斷拒絕預先決定價值的存有論位置（客觀存在或主觀賦予），而主張價值在實踐的承擔過程中湧現。藉由 Arendt 的三分論來說，本文認為，承擔判斷使得零工勞動者有機會在勞動 (labor) 的結構限制下，仍可能開啟向工作 (work) 移動的微小空間，擺脫只能停留在勞動之獸的層次。這並不是完全克服異化，而是在異化中撐開一個使意義得以生成的裂隙：相對於 Ricoeur 的敘事認同理論，本文將其「情節化」概念由主要是認知—詮釋性的操作，進一步推向實踐—倫理性的承擔；情節化不只是理解自身經驗的方式，更是勞動者在具體實踐中為經驗負責、為判斷承擔的倫理行動。

就此而言，承擔判斷所標示的，是一種不同於純結構批判路線、也不同於純主體倫理路線的第三種進路。純結構批判傾向於將主體理

解為被結構全面決定的產物，微觀實踐在其中至多是意識形態的再生產；純主體倫理則傾向於將主體性的重建寄託於個人的意志決斷，而不充分考慮結構條件對實踐可能性的制約。本文的立場是：結構具有決定性影響，但不具有完全的決定性；主體的承擔具有倫理意義，但不獨立於社會條件而成立。承擔判斷正是在這個結構與能動性的張力之間運作的概念：它既承認社會條件對實踐的制約，又堅持在制約中仍存在不可被完全取消的判斷空間。

零工勞動雖在制度與結構上造成時間的破碎、認同的流動與關係的斷裂，但主體性並非因此而消亡。透過時間、關係與意義三個互補維度，勞動者仍能在片段化經驗中編織出具有延續性的生命敘事；三者互相支撐，構成零工勞動者在不穩定環境中自我生成的實踐基礎。

## 伍、承擔判斷的條件與限度

如前所述，「承擔判斷」所標示的，是貫穿匠心與編輯思維之實踐的核心機制，亦即勞動價值與主體性在具體實踐中同時生成的關鍵環節。然而，並非所有的零工勞動者都是同質的群體，不同類型的零工勞動者所面臨的結構壓迫程度、所擁有的實踐資源以及所遭遇的主體危機深度等，都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為此，首先需要梳理的，便是當代零工勞動者的類型光譜，以及其中主體危機的差異化程度。

### 一、零工勞動者的類型光譜與主體危機的差異化

當代零工勞動涵蓋了極為異質的勞動形態。De Stefano 曾區分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透過數位平台媒合、在特定地點完成的「隨需勞動」(work on-demand via apps)，如外送、叫車、清潔等服務；另一種是透過線上平台分派、可在任何地點完成的「群眾外包」(crowd

work)，如資料標註、微型任務、線上設計等 (De Stefano 2016)。Manyika 等人則由勞動者的動機與收入結構出發，將獨立工作者區分為四種類型：以獨立工作為主要收入且出於自主選擇的「自由行動者」(free agents，約佔 30%)、以獨立工作為補充收入且出於自主選擇的「休閒兼差者」(casual earners，約佔 40%)、以獨立工作為主要收入但實為不得已的「不情願者」(reluctants，約佔 14%)，以及出於經濟壓力而從事補充性獨立工作的「經濟困頓者」(financially strapped，約佔 16%) (Manyika et al. 2016)。

這兩組分類各有側重：De Stefano 的區分著眼於勞動過程的組織形式與技術條件，Manyika 等人則關注勞動者的動機與經濟處境。若將兩者合觀，並由本文所關注的主體性問題出發，則可以辨識出一條由相對自主到深度受制的光譜：在光譜的一端，是具有專業技能、擁有一定市場議價能力、能夠自主選擇專案與合作對象的獨立工作者（如自由接案的設計師、顧問、譯者等），他們在相當程度上仍保有技藝的時間累積性、專業社群的關係可見證性，以及對自身勞動意義的詮釋空間；在光譜的另一端，則是高度依賴平台派單、勞動過程被演算法深度支配、且往往出於經濟必要而從事此類工作的勞動者（如平台外送員、叫車司機、線上微任務承接者等），他們的遭遇，諸如時間被即時調度所切割、關係被匿名交易所消解、意義被績效指標所覆蓋等，正是本文在前幾節所分析的系統性主體危機。

這條光譜上主體危機最深的一端，恰恰也是零工勞動人口中最為龐大的群體。根據 Manyika 等人的數據，「不情願者」與「經濟困頓者」合計約佔獨立工作者的 30%，而這個比例在發展中國家與東亞社會中可能更高。這些勞動者所面臨的困境，集中體現了本文所分析的存在論層次的敘事斷裂：他們的勞動經驗在時間上難以累積、在關係上難以穩定、在意義上難以統整為可被敘說的生命脈絡。正是對這一群體的關注，構成了「承擔判斷」作為理論概念的真正試金石：

如果承擔判斷只能在條件相對優越的自由行動者身上成立，那麼它的理論效力便是有限的；它必須能夠面對條件最為惡劣的處境，才能真正回應零工勞動的核心問題。

## 二、在結構壓迫最深處追問承擔判斷的可能

承擔判斷的展開預設了不可忽略的社會條件，而這些條件往往超出勞動者個人所能獨自創造的範圍。Ricoeur 在論述敘事認同時，區分了「同一性」(idem, sameness) 與「自身性」(ipse, selfhood) 兩種自我理解的方式：前者是可辨識的持續特徵，如性格、習慣與社會角色；後者則指涉那種即便在變動中仍然承諾「是我在承擔」的倫理自我(Ricoeur 1992)。敘事認同正是在這兩者的辯證張力中構成的，關鍵在於，這兩種自我理解都需要相應的社會條件：同一性的維持需要經驗得以在時間中沉澱的條件，自身性的承擔則需要一個使承諾得以被接收的社會空間，亦即，當一個人說「我為此負責」時，必須存在能夠聽見、回應並承認這個承諾的他者與脈絡。

據此，承擔判斷的展開至少預設了三重社會條件：時間的可積累性，使技藝的反覆實作與漸進深化成為可能；行動的可見證性，使品質堅持與倫理承諾有可能被同行、顧客或社群所感知與回應；以及詮釋的可理解性，使勞動者對「何謂值得」的判斷有可能在某個共享的價值框架中獲得意義。對照上一節所描繪的類型光譜，自主性較高的一端仍保有這三重條件的一定基礎；然而，在主體危機最深的一端，這三重條件正同時遭受系統性的弱化：平台的即時調度壓縮了時間的可積累性，匿名的線上交易則削弱了行動的可見證性，而演算法主導的評價體系更侵蝕了詮釋的可理解性。承擔判斷之所以困難，正是因為使其得以展開的社會條件正在流失。這產生了一個核心悖論：條件越有利，承擔判斷越容易展開，但也相對較不迫切；條件越惡劣，承擔判斷越困難，卻也越發必要，因為若不主動承擔，主體便可能徹底

失去任何超越謀生的價值維度。

面對這個悖論，需要同時堅持兩個看似矛盾的立場。一方面，微觀的承擔判斷無法取代宏觀的制度改革；要根本改善零工勞動者的處境，所需要的是平台演算法的透明化與可問責性、零工勞動者的集體協商權、基本的社會保障與勞動法規保護，以及對平台資本主義的結構性規制等 (De Stefano 2016; Schor 2020; Vallas & Schor 2020)。條件越惡劣，個體的承擔越是孤立無援，也越是凸顯制度改革的緊迫性。另一方面，即便在制度改革尚未到來之前，在每個孤立的個體仍需獨自面對演算法的時刻，承擔判斷作為維持主體性的最低限度實踐，仍具有不可被取消的哲學意義。Scott 在分析底層群體的「日常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 時曾指出，即使是微小的、個體性的不順從行動，也具有維持主體尊嚴與抵抗意識的功能，而不應僅因其未能撼動整體結構便被視為無意義 (Scott 1985)。在類似的意義上，一個平台外送員在完成配送時對餐點擺放方式的微小堅持，一個微任務承接者在標準化流程中對品質細節的額外關注，一個叫車司機在匿名交易中對服務態度的自我要求等，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實踐，在存在論的層次上守護了一個不可被完全取消的主體空間，即：勞動者作為判斷者的存在位置。此外，個體的承擔判斷也可能構成集體行動的主體前提。一個完全放棄判斷、完全內化市場邏輯的主體，難以參與任何有意義的集體抵抗 (Hardt & Negri 2017)。微觀的承擔判斷實踐不會自動導向制度變革，個體的倫理堅持也無法取代結構性的政治行動；然而，即便結構有其決定性的影響，對微觀能動性的哲學思考仍不可放棄，尤其是在結構壓迫最深之處。

### 三、以自主與賦權為核心的零工論述之再檢視

將上述類型分析與條件分析合觀，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以自主、彈性與賦權為核心關懷這一類機會導向的零工論述，其洞見與盲

點究竟何在。

此類論述在學術研究、智庫報告與實務指南等不同層次上皆有展開。**Sundararajan** 由共享經濟的結構變遷出發，主張數位平台正在催生一種「群眾資本主義」(crowd-based capitalism)，其去中介化的特性使個體得以直接進入市場，從而開啟了傳統雇傭關係之外的經濟賦權空間 (**Sundararajan** 2016)。**Manyika** 等人的研究亦指出，自主選擇的獨立工作者在工作滿意度上甚至高於傳統雇傭關係中的勞動者 (**Manyika et al.** 2016)。在更接近實務指南的層次上，**McGovern** 強調零工勞動為專業人才創造了跨專案流動與獨立品牌建構的機會 (**McGovern** 2017)，**Mulcahy** 則主張勞動者可藉由建立「職業投資組合」來分散風險、實現兼顧專業發展與生活平衡的職涯策略 (**Mulcahy** 2016)。台灣亦有此類論述的版本，例如宋憶萍便以自己作為具有專業背景的接案工作者為主視角，呈現了一種透過零工收入支撐母職理想的生涯安排，其核心邏輯是：透過靈活的接案策略賺取足夠的收入，從而在勞動之外實現真正重要的生活目標（宋憶萍 2021）。這與 **McGovern** 以專業接案支撐個人理想生活的論述結構高度相近；兩者的共同預設在於：勞動的價值僅在於它為勞動之外的生活目標所提供的條件。

這些論述確實捕捉到了零工勞動中某些具體存在的實踐面向。然而，此類論述所描繪的圖景，主要對應的是零工勞動光譜上自主性較高的那一端；對於「不情願者」與「經濟困頓者」，這套論述所能提供的解釋框架則顯得相當有限。**Sundararajan** 所描繪的「群眾資本主義」願景，預設了勞動者具有直接進入市場的能力與資源；**McGovern** 的品牌建構與定價策略，預設了勞動者擁有可被市場辨識的專業技能；**Mulcahy** 的「職業投資組合」，更是預設了勞動者有足夠的時間與財務餘裕來進行多元配置；宋憶萍的生涯敘事同樣預設了勞動者擁有可靈活調度的專業技能與時間自主性，使零工收入得以服務於母職

理想的實現。這些預設，對於一個被演算法即時調度、收入僅夠維持基本生存、勞動過程被高度標準化的平台外送員而言，幾乎完全不適用。

適用範圍的侷限只是問題的表層。更根本的問題在於，此類論述有著一個共同且深層的邏輯預設：零工勞動的困境本質上是一個策略問題，可以透過更有效的市場參與、更靈活的資源配置來解決，而勞動本身的價值，最終仍由其所換取的市場報酬來衡量。在此框架中，勞動被徹底工具化：它是達成勞動之外那個「真正的生活」的手段，無論那個生活的具體內容是職涯發展、休閒自由，還是母職的理想實踐。Mulcahy 的論述結構尤為清晰地展現了這個邏輯：其隱含的路徑是「優化勞動效率→擴大閒暇空間→在閒暇中實現自我」的線性方案 (Mulcahy 2016)。宋憶萍的敘事結構與此如出一轍，只是將「閒暇中的自我實現」置換為「陪伴子女的母職實踐」：零工勞動的意義在於它能夠提供足夠的彈性與收入，使母職的理想得以實現，而非勞動本身具有獨立的意義位置。這恰恰重現了 Arendt 對「勞動」(labor) 的批判性診斷：在生命必然性所支配的勞動結構中，活動本身並不具有內在的意義；主體性的顯現被推遲到勞動之外，唯有在行動的層次中才可能發生 (Arendt 1958/1998)。即使是 Sundararajan 對「群眾資本主義」的願景，其所描繪的賦權也主要是市場參與意義上的賦權，尚未觸及在勞動過程本身中生成主體性的那種倫理意義上的賦權。

要之，此類論述從未追問一個關鍵問題：在這些市場策略與自我經營的實踐中，價值判斷的最終權力歸屬何處？當 McGovern 建議勞動者「為自身服務正確定價」時，「正確」的標準來自市場供需；當 Mulcahy 鼓勵讀者「定義屬於自己的成功」時，這個定義的座標軸是收入、閒暇與消費選擇的組合；當宋憶萍描繪零工收入如何支撐母職理想時，勞動的價值仍然取決於其市場回報是否充分，而非取決於勞動本身。換言之，此類論述雖然在話語層面上訴諸「自主」與「選

擇」，但其價值判準始終未能脫離新自由主義治理理性所預設的市場框架。就此而言，這套論述在實質上構成了新自由主義治理邏輯在勞動者自我理解層面的精緻再生產：它將結構性的風險轉嫁包裝為個人選擇的自由，將市場適應包裝為自我實現，而從未觸及價值判斷權本身的歸屬問題。

承擔判斷所揭示的，則是同一類實踐中被這套論述系統性地遮蔽的另一重維度。當一個勞動者對品質的堅持並非出於「這樣做能獲得更好的市場回報」的計算，而是出於「這是我認為值得的工作方式」的承擔時，驅動行動的內在邏輯便發生了根本的轉換。表面上，兩種邏輯可能導致外觀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行動，同樣的服務品質、同樣的時間投入、同樣的細節關注，但其倫理意涵截然不同。在市場優化的邏輯中，行動的理由是工具性的：如果市場不再獎勵這種品質堅持，理性的選擇就是放棄它。在承擔判斷的邏輯中，行動的理由則內在於實踐本身：即便市場不獎勵，甚至懲罰這種堅持，勞動者仍然可能選擇堅持，因為這個堅持本身就是他對「勞動應該是什麼」的回答。這種在反覆實作中對品質標準的內在化與持續深化，正是本文所論之匠心的具體展現；而將零散的、異質的勞動經驗統整為具有連貫意義的實踐脈絡，使每一次接案不僅是孤立的任務完成，而是一個持續發展的專業敘事中的有機環節，則是編輯思維在零工勞動中的運作方式。此類論述之所以能觀察到這些實踐卻始終無法把握其倫理意涵，正是因為它缺乏承擔判斷這個概念環節：在沒有承擔判斷的框架中，匠心只能被讀成品牌策略，編輯思維只能被讀成職業投資組合的管理，勞動者對品質與意義的堅持只能被歸入「更聰明的市場參與」這個範疇。

就此而言，承擔判斷與此類論述的分歧，並不在於「誰來決定價值」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同，而在於問題本身的結構不同：以自主與賦權為核心的論述預設了一個已然確定的價值框架（市場），然後詢問

勞動者如何在這個框架中最有效地定位自身；承擔判斷則追問，勞動者是否有可能在實踐中生成一種不被既定框架所預先決定的價值理解。用 Ricoeur 的話來說，前者處理的是同一性層次上的問題，亦即如何在既定的角色結構中維持可辨識的連續性；後者觸及的則是自身性層次上的問題，亦即在變動與斷裂中，是否仍有一個承諾「是我在承擔」的倫理主體。由此可以看到，承擔判斷與此類論述之間並非簡單的對立，而是一種不對稱的包含關係：此類論述所觀察到的那些實踐，在承擔判斷的框架中並未被否定，而是被重新理解，它們之中可能蘊含著超出市場策略的倫理維度，但這個維度不是必然的，而是取決於勞動者是否在其中承擔起了判斷的責任。承擔判斷作為理論概念的功能，不是提供一個從外部區分兩者的判定標準，而是開啟一個被既有論述所封閉的提問空間：在零工勞動的具體實踐中，除了市場邏輯之外，是否還存在著另一種價值生成的可能？

#### 四、未盡的課題

近年來，零工勞動者的認同困境已逐漸受到組織行為與勞動研究領域的關注。Petriglieri 等人對獨立工作的研究發現，在缺乏組織歸屬的條件下，勞動者面臨「不穩定而個人化的職業認同」所帶來的深層情感張力，並往往需要透過主動建構「持守環境」(holding environments) 來維繫自身認同的連續性，這包括了固定的工作慣例、地點、人際連結與更廣泛的目標感等 (Petriglieri et al. 2019)。Caza 等人則進一步系統化地指出，認同挑戰 (identity challenge) 與職業路徑不確定性 (career-path uncertainty) 是零工勞動者所面臨的核心困境，其根本來源在於缺乏穩定的角色結構，使勞動者難以維持可被辨識的自我連續性 (Caza et al. 2022)。

這些研究雖然觸及了認同的維持與挑戰問題，其切入角度仍主要是心理學與組織行為學，關注的是勞動者如何在不穩定條件下進行情

感管理與認同工作，而較少就存在論與實踐倫理的層次追問：在敘事連續性系統性斷裂的條件下，勞動者是否仍有可能承擔起對自身實踐之意義、方向與品質的判斷責任等問題。這正是本文所論之承擔判斷尚待進一步經驗研究支撐的面向；而對於光譜上主體危機最深的那一端，這個方法論上的挑戰尤其迫切：如何在高度標準化與即時化的工作流程中，辨識並記錄承擔判斷的具體展現，仍有待深入的研究探索。

匠心與編輯思維在不同類型零工勞動中的差異化表現，同樣是一個尚待展開的問題。對於自由接案的創意工作者而言，匠心可能展現為對作品品質的長期堅持，編輯思維可能展現為對跨域經驗的主題式整合；但對於平台外送員而言，匠心與編輯思維究竟可以採取何種具體形式？它們是否需要在概念的具體應用上做出調整或擴展，才能適用於勞動過程被高度標準化的情境？這些問題的回答，將直接影響承擔判斷作為理論框架的適用範圍。

承擔判斷如何可能從個體的倫理堅持轉化為集體的政治行動，是另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個體的敘事重構如何可能匯聚為制度改革的動力？微觀的主體實踐與宏觀的制度變革之間，需要什麼樣具體的中介機制？這些追問超出了本文的處理範圍，但它們標示了承擔判斷這個概念在後續研究中可能延伸的方向。

## 陸、結論

本文由零工勞動的結構性異化出發，經敘事連續性斷裂的分析，指出當代勞動在任務化、評價化與即時化的運作條件下，如何逐步失去作為生命敘事支點的地位。問題不僅在於工作類型的不穩定或保障的不足，更在於勞動是否仍容許勞動者將自身行動理解為一段可以承擔、可以回應、也可以負責的生命歷程。當時間被切割為可計量的片段，關係被壓縮為功能性的接口，意義被還原為即時回饋的指標時，

勞動所面臨的，已是一種主體性層次的危機。

正是在這個脈絡中，本文提出以「承擔判斷」作為理解勞動價值與主體性同時生成的關鍵概念。此一概念試圖指出一更為根本的界線：勞動之所以仍然能夠被理解為人的勞動，正在於勞動者是否仍然被期待、允許為時間的使用方式、為關係的維繫品質、為意義的判斷標準負起責任。一旦這種承擔被系統性地排除，勞動便只剩下可被調度、可被計量、可被評價的操作流程，而主體性也隨之退化為系統中的一個可替換節點。

由此出發，匠心與編輯思維是兩種不同方向的主體生成實踐。匠心所涉及的，是在時間中對技藝節奏與品質要求的持續承擔，使勞動不至於完全被即時評價與加速邏輯所吸納；編輯思維所涉及的，則是在多重角色與碎裂經驗之間進行重組與編織的判斷工作，使勞動者仍有可能維持某種可敘事的自我一致性。兩者並不能保證穩定的結果，也不承諾對結構條件的超越，而只是指出：即使在高度碎片化與不穩定的勞動條件下，主體生成仍然可能以有限而脆弱的方式持續發生。

這樣的理解也使本文得以在既有的理論格局中確立自身的位置。結構批判路線深刻揭示了零工勞動中主體性所遭受的系統性侵蝕，機會導向論述則承認勞動者的能動性，卻未能超出市場邏輯的框架。承擔判斷所指向的第三條路徑，既不否認結構壓迫的深刻制約，又堅持在最深的制約中仍存在不可被完全取消的判斷可能，不是因為結構的力量可以被忽略，而是因為判斷的責任內在於實踐本身。正是從這個立場出發，本文才能進而追問一個被兩條路線共同迴避的問題：勞動是否仍生產了人本身？

相較於追問勞動生產了什麼，本文所試圖凸顯的，是勞動者在承擔判斷的過程中所生成的那個能夠對自身行動負責、能夠將經驗理解為一段敘事的主體，而這正是勞動最深層、也最容易被忽略的「產出」。若這種生成被系統性地阻斷，那麼即使勞動在經濟意義上高度

有效率，在存在論的意義上，它仍可被視為一種失敗的勞動。由這個角度來看，零工勞動並非只是眾多勞動形態之一，而更像是一面放大鏡，使當代勞動世界中原本已然存在的敘事斷裂趨勢以更為集中的方式顯現出來。由績效導向的管理制度到專案化的知識生產，由演算法驅動的內容平台到高度標準化的服務流程，類似的治理邏輯正不斷壓縮勞動作為主體生成場域的空間。這個趨勢在光譜上主體危機最深的一端尤為嚴峻：對於那些被演算法即時調度、勞動過程被高度標準化的勞動者而言，承擔判斷的社會條件正在同時流失，使得這種最低限度的主體實踐愈加困難，卻也因此愈加必要。本文嘗試劃出一條理論上的最低界線：只要承擔判斷的實踐尚未被徹底消除，勞動就仍然不只是生產與交換的機制，而仍然是人之生成的場域。

總結而言，本文嘗試在零工勞動的條件下重新思考勞動主體性的問題。要點在於：主體性是在具體勞動實踐中，透過對時間、關係與意義的承擔判斷而持續生成的過程。在碎片化與短期化的勞動條件中，這種生成或許是困難的、微弱的、永遠處於被消解的風險之中；但正是這份困難中的堅持，標示了勞動之為人的實踐、而非僅為謀生之手段的不可讓渡之處。

## 參考文獻

中文：

安藤昭子 ANDO Akiko，2022，《向編輯學思考：激發自我才能、學習用新角度看世界，精準企畫的 10 種武器》*Xiang bianji xue sikao: Jifa ziwocaineng xuexi yong xinjiaodu kan shijie jingzhun qihua de 10 zhong wuqi*（才能をひらく編集工学：世界の見方を変える 10 の思考法），許郁文譯 Trans. by XU Yuwen，臺北 [Taipei]：經濟新潮社 [EcoTrend Publications]。

行政院主計總處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2022，111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Report on the Manpower Utilization Survey. Reference Period: May, 2022，available from <https://ws.dgbas.gov.tw/001/Upload/463/relfile/11091/230414/0dbf-ab0b-c84a-474e-9f93-b2c68de2fc9d.pdf>。查閱日期：2026 年 4 月 17 日 Accessed April 17, 2026。

行政院主計總處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2023，112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Report on the Manpower Utilization Survey. Reference Period: May, 2023，available from <https://ws.dgbas.gov.tw/001/Upload/463/relfile/11091/232682/a381-b840-c68c-42c3-8943-ae66668d696c.pdf>。查閱日期：2026 年 4 月 17 日 Accessed April 17, 2026。

行政院主計總處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2024, 113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Report on the Manpower Utilization Survey. Reference Period: May, 2024, available from <https://ws.dgbas.gov.tw/001/Upload/463/refile/11091/234273/e47f37ef-3d78-4249-99ee-fbfeb3e7cda.pdf>。查閱日期：2026 年 4 月 17 日 Accessed April 17, 2026。

宋憶萍 SONG Yiping, 2021, 《全職媽媽的零工經濟：平衡夢想與母職的斜槓生活學》 *Quanzhi mama de linggong jingji: pingheng mengxiang yu muzhi de xiegang shenghuoxue*, 臺北 [Taipei]: 華品文創 [Chinese Creation Publishing Co., Ltd]。

沈志勳 SHEN Chih-Hsun、邱雅芳 QIU Yafang、蔡宜縉 TSAI Yi-Ching, 2023, 〈零工經濟時代的社會保障課題探討〉 *Linggong jingji shidai de shehui baozhang keti tantao*, 國家發展委員會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available from <https://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10/refile/0/15590/9cb522cc-fabf-4ac4-878e-6bb42a02d63b.pdf>。查閱日期：2026 年 4 月 17 日 Accessed April 17, 2026。

松岡正剛 MATSUOKA Seigo, 2023, 《知識的編輯學：日本編輯教父松岡正剛教你如何創發新事物》 *Zhishi de bianjixue: Riben bianji jiaofu songgangzhenggang jiaoni ruhe chuangfa xinshiwu* (知識の編集工学), 許郁文譯 Trans. by XU Yuwen, 臺北 [Taipei]: 經濟新潮社 [EcoTrend Publications]。

## 西文：

Arendt, H. 1958/199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8)
- . 1982.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by Ronald Bei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2003.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Ed. by Jerome K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Boltanski, L., & Chiapello, E. 1999/2005.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by G. Elliott. London: Verso.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9)
- Brown, W. 2015. *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 New York: Zone Books.
- Butler, J. 2015. *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za, B. B., Reid, E. M., Ashford, S. J., & Granger, S. 2022. Working On My Own: Measuring the Challenges of Gig Work. *Human Relations*, 75(11): 2122-2159.
- Dardot, P., & Laval, C. 2014. *The New Way of the World: On Neoliberal Society*. Trans. by G. Elliott. London: Verso.
- Dean, M. 2010. *Governmentality: Power and Rule in Modern Society* (2nd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van Doorn, N. 2017. Platform Labor: On the Gendered and Racialized Exploitation of Low-Income Service Work in the 'On-Demand' Econom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6): 898-914.
- van Doorn, N., & Badger, A. 2020. Platform Capitalism's Hidden Abode: Producing Data Assets in the Gig Economy. *Antipode*, 52(5): 1475-1495.

- Eurofound. 2018. *Employment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selected types of platform work*.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 Foucault, M. 1982. The Subject and Power. *Critical Inquiry*, 8(4): 777-795.
- . 2007.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78*. Trans. by G. Burche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 2008.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Trans. by G. Burche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Fuchs, C. 2014.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 Gandini, A. 2019. Labour Process Theory and the Gig Economy. *Human Relations*, 72(6): 1039-1056.
- Gray, M. L., & Suri, S. 2019. *Ghost Work: How to Stop Silicon Valley from Building a New Global Underclas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Han, B.-C. 2015. *The Burnout Society*. Trans. by E. Butl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dt, M., & Negri, A. 2017. *Assemb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idegger, M. 1927/1962. *Being and Time*. Trans. by J. Macquarrie & E. Robinson. Harper & Row.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
- Horkheimer, M. 1947. *Eclipse of Rea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rkheimer, M., & Adorno, T. W. 1944/2002.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by E. Jephcot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4)

Huws, U. 2014. *Labor in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Monthly Review Pres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21.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2021: The Role of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in Transforming the World of Work*.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Kalleberg, A. L. 2011. *Good Jobs, Bad Jobs: The Rise of Polarized and Precarious Employment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0s-2000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Kellogg, K. C., Valentine, M. A., & Christin, A. 2020. Algorithms at Work: The New Contested Terrain of Control.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14(1): 366-410.

Manyika, J., Lund, S., Bughin, J., Robinson, K., Mischke, J., & Mahajan, D. 2016. *Independent Work: Choice, Necessity, and the Gig Economy*.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arx, K. 1867/1976. *Capital, Volume 1*. Trans. by B. Fowkes. London: Pengu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67)

———. 1844/2007.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rans. by M. Milligan.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44)

McGovern, M. 2017. *Thriving in the Gig Economy: How to Capitalize and Compete in the New World of Work*. Wayne, NJ: Career Press.

Mulcahy, D. 2016. *The Gig Economy: The Complete Guide to Getting*

*Better Work, Taking More Time Off, and Financing the Life You Want.* New York, NY: AMACOM.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19: The Future of Work.* OECD Publishing.

Pasquale, F. 2015. *The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Algorithms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triglieri, G., Ashford, S. J., & Wrzesniewski, A. 2019. Agony and Ecstasy in the Gig Economy: Cultivating Holding Environments for Precarious and Personalized Work Identiti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4(1): 124-170.

Ravenelle, A. J. 2019. *Hustle and Gig: Struggling and Surviving in the Sharing Economy.*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ad, J. 2009. A Genealogy of Homo-Economicus: Foucault, Neoliber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Foucault Studies*, (6): 25-36.

Ricoeur, P. 1984.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1.* Trans. by K. McLaughlin & 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2. *Oneself as Another.* Trans. by K. Blam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sa, H. 2013.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Trans. by J. Trejo-Math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ose, N. 1999. *Powers of Freedom: 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enblat, A., & Stark, L. 2016. Algorithmic Labor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A case study of Uber's driv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 3758-3784.
- Schor, J. B. 2020. *After the gig: How the Sharing Economy Got Hijacked and How to Win It Back*.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ott, J.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ennett, R. 1998.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 2008. *The Craftsm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e Stefano, V. 2016. The Rise of the “Just-In-Time Workforce”: On-demand Work, Crowdwork, and Labor Protection in the “Gig-Economy”. *Comparative Labor Law & Policy Journal*, 37(3): 471-504.
- Smith, A. 1776/19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by R. H. Campbell & A. S. Skinn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76)
- Srnicek, N. 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Sundararajan, A. 2016. *The Sharing Economy: The End of Employment and the Rise of Crowd-Based Capital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Vallas, S., & Schor, J. 2020. What Do Platforms Do? Understanding the Gig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6: 273–294.

- Weber, M. 1904/2001.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by T. Parsons. New York, NY: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4)
- Wood, A. J., Graham, M., Lehtdonvirta, V., & Hjorth, I. 2019. Good Gig, Bad Gig: Autonomy and Algorithmic Control in the Global Gig Economy.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33(1): 56-75.
- World Bank. 2023. *Working Without Borders: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Online Gig Work*.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From Alienation to Reconstruction: Rethinking Labor Value and Subjectivity in Gig Labor

YANG Shi-Chi

Institute of Social Innovatio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ddress: No. 70, Lianhai Rd., Gushan Dist., Kaohsiung City 804201,  
Taiwan (R.O.C.)

E-mail: [simbaya@mail.nsysu.edu.tw](mailto:simbaya@mail.nsysu.edu.tw)

## Abstract

Contemporary gig labor has given rise to a distinctive crisis of subjectivity. With the rise of digital platforms and algorithmic governance, task fragmentation, rating mechanisms, and unstable temporal structures have systematically eroded the possibility of labor serving as the foundation for self-understanding and life narrative, leaving workers caught in a triple rupture of narrative continuity: the inability to accumulate experience over time, to stabilize relationships, and to integrate meaning into a coherent life story. This article takes this condition of rupture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asking whether workers can still rebuild a form of life narrative that remains livable and sustainable.

The central argument is that narrative continuity is the key condition

for reconstructing labor value and subjectivity, and that such continuity is built graduall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judgment” (承擔判斷) across three intertwined dimensions: time, relationships, and meaning.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workers assume an inalienable responsibility—in concrete labor practice—for how time is used, the quality of relational commitment, and the standards by which meaning is judged. In this act of taking responsibility, value is neither unilaterally determined by markets or algorithms, nor an arbitrary inner projection, but something that emerges from practice itself. The reconstruction of labor valu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are therefore not two separate tasks, but are generated simultaneously in the practice of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judgment. Through the two complementary paths of craftsmanship and editorial thinking, workers are able to enact this responsibility: the former centers on sustained commitment to craft and long-term technical dedication, while the latter centers 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fragmented experience and the weaving of meaning—together enabling a response to the triple rupture of narrative continuity that gig labor brings about.

A further argument concerns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such responsibility becomes possible. The spectrum of gig worker types determines the availability of those conditions, which means that micro-level subjective practice cannot replace macro-level institutional reform. Yet even where conditions are most adverse,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judgment remains as a practice of last resort for sustaining subjectivity—one whose philosophical force cannot be entirely extinguished.

**Keywords:** gig work, narrative, craftsmanship, editorial thinking,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judgment, subjectivity, value